

湖南红色文化的精神特质

刘建武

“一草一木一英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三湘大地“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湖南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红色是湖南最亮丽的底色。

湖南红色文化源于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实践的创造性结合，源于伟大建党精神在湖南的生动实践，源于近代湖南人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源于底蕴深厚的湖湘文化的滋养。湖南红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各个时期党领导进行的人民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在湖南的生动体现，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见证。湖南红色文化经历了建党时期、大革命时期、开辟革命新道路时期、革命根据地时期、长征时期、敌后斗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涌现出以革命领袖、开国将帅、革命英烈、先进楷模和红色湘女为代表的一大批红色文化之星。

湖南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资源大省，已查明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有1700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9处，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藏品8万余件套。全省拥有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70余处，其中国家级29处，省级以上158处，资源总量、重要资源数量均居全国前列。一处处奋斗遗址，一件件革命文物，一个个红色故事，都真实记载了湖南红色文化的足迹，凝结着湖南红色文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特质。

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信念

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的强大精神支柱。

大革命时期在湘潭、湘乡一带坚持地下斗争的原省农民协会自卫队队长王则鸣被清乡队逮捕并杀害。他在临刑前留下一首绝笔诗：“奔走湘鄂有三秋，事业不成令人忧。不幸吾身牢中囚，死到黄泉心不休。”在白色恐怖中从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在与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告别时，送给妻子一颗红珠，并附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抚幼女慈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夏明翰被捕后，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劝他投降，但28岁的夏明翰视死如归，在行刑之前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湘南起义后留在耒阳坚持游击斗争的县游击队队长毛泽建在战斗中被捕，敌人以她系毛泽东之妹，用封官许愿和酷刑拷打妄图从她身上获取重要机密，但她坚贞不屈，写下“誓死为党”的遗书后英勇就义。

在湖南，这样英勇奋斗的共产党员无以数计。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奋不顾身地拼搏和奋斗，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无畏气概

回望百余年征程，湖南有无数革命先烈、

英雄模范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舍生忘死，付出巨大牺牲。如在贺龙的贺氏宗亲中，烈士多达2050位。1921年至1949年，平江县先后有23万多人为革命牺牲，其中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1万余人。

这些人的牺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什么让他们舍生忘死、流血奋斗？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例子来感悟。出生于醴陵一个富裕家庭的陈觉，与赵云霄作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在莫斯科留学时相识相爱，结为伉俪。1928年，他们先后被捕入狱。陈觉在临刑前给妻子写信说：“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几个月后，赵云霄在给襁褓中的女儿喂过最后一口奶后，毅然走上刑场，牺牲时年仅22岁。她在给女儿的遗书中写道：“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

1876年出生于宁乡的何叔衡，1902年考中秀才，他本可以在家乡安稳、富足和体面地度过一生，却选择走上充满坎坷的革命之路。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我绝对不是我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他曾这样说：“作共产党员，就应该不怕死，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共产党。”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从江西转至福建长汀的突围战斗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他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时年59岁。他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坚定誓言。

这些革命前辈身上所体现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气概。

三、“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

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做到敢为人先，离开了实事求是就只能盲目冒进。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党内最早鲜明地提出实事求是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党会在他的领导下率先走出一条历史上从来没有入走过的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与湖南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精神的不懈追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07年，14岁的毛泽东在韶山读到了《盛世危言》这本书。据不完全统计，这本书里共12处提到了“实事求是”，特别是把“实事求是”与“振兴中华”相联系，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振兴中华”前提。可以说，正是这本书，使毛泽东最早接触到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知道了“实事求是”这个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从东山学校到长沙求学期间，一直受到“实事求是”的熏陶和影響，直接体现在东山学校、第一师范、岳麓书院以及杨昌济、徐特立等教育家身上所体现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传统和观念。1917年由宾步程题写并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

理论·文史哲

投稿邮箱：hnrblwsw@163.com

之上的“实事求是”牌匾，作为一块历经百年岁月的匾额，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文化意义的。今天，这块“实事求是”匾额，已远远超出了当年题写者所讲求的严谨治学、学用统一的认识范畴，成为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见证和文化象征。它既承载了千余年来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又凝练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核；既显示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既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奋斗者，又昭示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时代方向。正是基于“实事求是”这种超越时空的思想魅力、价值导向和精神穿透力，习近平总书记才在岳麓书院提出了“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的重要论断。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但只有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地运用才有意义。如果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简单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还会走上歧途，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导致革命的失败。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没有“遵循”中心城市暴动的道路，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偏僻落后的农村，从而开辟了一条独特而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正是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关系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把实事求是是精神贯彻到底，是要付出巨大努力甚至是生命的。刘少奇在谈到如何才能实事求是时，说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他还提出，“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习近平说：“刘少奇同志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

从毛泽东到刘少奇、彭德怀，再到胡耀邦等等，在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湖南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

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

“为人民服务”这个观念，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如果不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准则，作为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不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尽心竭力为人民办事，而是去追求个人的金钱享受、权力地位，就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雷锋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虽然雷锋已经去世60多年了，但他仍然是中国人心

“为人民做好事”的代名词。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毛泽东说，“我看过雷锋日记的一部分，此人懂得一点哲学”，并向全党和全国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中高度赞扬徐老一贯充沛的革命热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他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你是什么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徐特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把毛泽东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体化为了“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被毛泽东称为“坚强的老战士”“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八七会议上，23岁的他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长征穿越草地粮食耗尽时，他和战士一起把身上的牛皮带切成小块煮了充饥。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成为我党最年轻的“五大书记”之一。解放战争时期，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并指挥了三大战役。他因身体原因长期抱病工作，但他始终恪守的准则是：“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举行开国大典时，因为病情严重，他只能在病榻上通过收音机收听盛典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他以30年的革命生涯，将生命定格在了46岁。叶剑英说：“他是我们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任弼时的“骆驼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铸就我们的事业。二是“怕工作少，怕麻烦人，怕多用钱”。这“三怕”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心里只有人民、唯独没有自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共产党人的信条，也是湖南红色文化的内在本质。

红色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鲜亮的颜色，红色文化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样态和灵魂本色，湖南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崇高品格是湖南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湖南红色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湖南实际相结合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和伟大民族精神在湖南的具体实践和生动体现，是党领导湖南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文化结晶，是新时代继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就是要把湖南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崇高精神和内在灵魂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走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湖南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党的武装斗争思想、重大军事战略、革命军事力量在此孕育、实践、产生，书写了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

前瞻性培养军事人才。毛泽东亲自领导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长沙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便展现出培养军事人才的战略远见。1921年8月创立的湖南自修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为学员走上军事指挥岗位、参与武装暴动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湘区委高度重视军事人才培养，相继输送大批共产党员参与黄埔军校建校建军等重要事务，一批湖南有志青年在军队中通过政治工作的方式开展军事活动，成为革命武装的中坚力量。人才培养与实践积累，为思想孕育提供了沃土。

创造性组织工农武装。大革命期间，中共湖南地方组织十分重视工人武装的武力保障作用，在领导开展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期间，创造性建立了工人纠察队，还结合湖南农民运动基础优势，发起成立岳北农工会，开创工农“握手革命”之先河。北伐开始后，湖南不断推动工农武装制度化与规模化，推动全省普遍建立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以保卫革命成果。“马日事变”后，湖南省农民协会迅速发起反击，组建数万人的湖南工农义勇军武装进攻长沙，展现了工农武装在危急关头的反击力量。

预见性宣传武装斗争。在大革命血与泪的教训中，毛泽东、蔡和森、罗亦农等湘籍共产党人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较早地看清清左派国民党的妥协性，积极宣传武装斗争思想。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促使会议最终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等人此前一系列关于武装斗争的预见性宣传和具体策略主张，为这次重大转折提供了重要思维准备，使中国共产党在遭受反革命血腥镇压后，能够迅速重整旗鼓，赢得宝贵的战略主动。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重大军事战略的重要实践地

“举什么旗”在湖南率先打出。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他与湖南省委坚持以共产党名义发动起义，率先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帜。湘赣边的“扛旗之举”推动了党内军事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不久后中央通过决议正式采纳湖南经验，确立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原则，也为后续全国武装起义指明方向。而后党在湖南相继领导发动了湘南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等一系列军事实践，系统探索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

“走什么路”在湖南坚定抉择。面对湘赣边秋收起义进攻长沙受挫局面，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作出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战略从中心城市暴动论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转变，成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起点。此后，井冈山、湘鄂赣、湘鄂西、湘赣、湘鄂川黔等环湖南边界地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相继涌现，并建立各级革命政权。湖南成为中国革命军事战略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转化地。

“往哪里去”在湖南初步研判。1934年夏，中央苏区反“围剿”失利，红军生存日益艰难。红6军团于危难之际从湘赣苏区集结突围，先遣探路西征，与湘西红2军团胜利会师，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和实现会师创造条件。同年12月，在湘江血战中遭受重创的中央红军行进至湖南通道，在“转移湘西”还是“西进贵州”的生死关口，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同意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正确主张，避免了一次可能导致全军覆没的重大危机，奏响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序曲。

湖南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力量的重要诞生地

主力部队在湖南发源。党在湖南领导发动的每次起义都宣告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在这些武装起义部队基础上，相继创建红4军、红5军、红3军等多支红军部队，组建发展成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红军三大主力中占了两个，为后续人民军队的改编、组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宝贵经验在湖南成形。实践孕育经验，经验指导实践。1927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炎陵水口镇叶家祠亲自主持新党员的入党仪式，从组织实践层面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1928年3月，他在炎陵县中村给部队上政治课，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培训工作的发端；4月，他在桂东县沙田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初步确立了纪律治军的原则，后面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外，毛泽东、彭德怀、贺龙、黄公略、段德昌等湘籍军事家在环湖南边界地区的军事斗争中，总结出了在密林山地、河湖港汊等不同地域开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解决了如何指导作战、战胜敌人并发展壮大自身军事力量的问题。

湘籍将帅若星辰闪耀。人才是建军治军之本。红军时期担任军长、军政委的湘籍将领在百人以上，任军级以上职务者多达200人，遍及红军各部队。开国将帅中湘籍202人，即：元帅3人，大将6人，上将19人，中将45人，少将129人。湖南是中将以上开国将帅中人数最多的省份。1989年、1994年，中央军委两次正式确定的中国当代革命军事家36人中湘籍有15人。

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高高打出中国共产党旗帜的坚定，到新时代全军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自觉，历史与现实共同证明：“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唯有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才能让人民军队在任何风浪面前永葆本色，在强国强军征程上行稳致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作者单位：军地合建湖南军事纪念馆专班。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湖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军事贡献研究”（23ZDB043）阶段性成果】

湖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军事贡献

梁栋 吴泽丽

文史哲